

【文学研究】

从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看奈达的“形式对应”理论

杨建国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以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为切入点,追溯了奈达的“形式对应”理论,进而指出这种理论的两面性: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求内容信息的对等,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形式对应,因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

关键词:英语语言文学;文学翻译;诗歌翻译;形式对应;移植;庞德;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5)03-0087-04

Nida's formal correspondence theory and Pound's English vers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YANG Jian-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to analyze Nida's theory of “formal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und's translation on Chinese classic poetr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not only should the content information be corresponded, the formal correspondence should also be applied. Because the form has its meaning, if the form is changed, the content is changed too.

Key words: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oetry translation; formal correspondence; transplantation; Pound; image

诗歌翻译历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更有德国诗人莫根斯泰恩(Christian Morgenstern)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这些话是否公允,暂且不论,但他们至少表明了诗歌翻译之难,正如有人所说,“诗歌是不可译的”。

由于中国古诗自身存在的特质以及中西诗歌存在的诸多差异,长久以来少有人问津中国古诗的翻译。或许最早的中国诗英译本当数英国人彼得·佩林(Peter Perring)所译的《花瓣:中国求爱诗》(The Flower Leaf: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此书出版于1824年,是当时浪漫主义诗人向东方寻求异国情调的产物。后来便有了1876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诗经》;涉足《诗经》翻译的还有韦纳(E.

T. C. Werner)、艾伦(C. F. R. Allen)、坚宁士(W. Jennings)等人。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发表英译中国诗集《华夏》的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庞德所译中国古诗在西方一度引起极大反响,可谓遍地褒扬;而在中国却受到极大的冷遇。本文摘取《华夏》中庞德所译古诗的片段,以示形式对应理论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一、关于形式对等

奈达曾提出翻译有两种形式:形式对应和内容对等。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意即译者把源语直接转换成目的语,即译者把重点放在原文或源语的表达形式上,译者尽一切可能使目的语的表达形式与源语的表达形式一致。

奈达曾经是反对形式对应的,他认为翻译过程

收稿日期:2005-05-11

作者简介:杨建国(1960-),男,陕西白水人,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的内容是第一位,形式是次要的。形式对应会抹杀原文的文化意义。在他后来的一部著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他改变了对形式对应的看法。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要尽可能地要做到形式对应。因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所以,翻译中形式的改变只有在以下五种情况下进行:1)直译原文会使意义发生错误;2)借用语会构成语义空白(semantic zero),因而可能使读者填入错误意义;3)形式对应会引起严重的意义不明;4)形式对应会产生不为原作者有意安排的歧义表达法;5)形式对应会引起译文语法错误、语体不和^[1]。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这句话反映了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诗歌之所以为诗,原因之一在于它特殊的建行模式,因此恐怕很少会有人把下面的片段认为是诗歌。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d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when feeling out of sight for the ends of Being and ideal Grace. I love thee to the level of everyday's most quiet need, by sun and candle light. I love thee freely, as men strive for Right ...

同样道理,我们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尽量保持诗歌的形式也显得非常重要。假如我们在翻译一首诗时,改变了诗歌的建行模式,把诗翻译成了散文,那“诗将不诗”了。可引用翁显良译李白《静夜思》的译文为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
Hoarfrost? 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一首中国古诗,在翁显良的笔下变成了散文^[2],无论译文多么优美,也无法为人们接受。

庞德的诗歌翻译堪称追求形式对应的楷模。在他的诗歌翻译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形式对应,很少对源语的偏离和变通。他不仅基本保留了源语的建行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他尽量甚至是刻意地保留了中文的表达方法和意象,把中文的表达法原原本本

地移植到了西方文化。

二、庞德英译中国诗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意象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曾在1915年出版译作《翠夏》(Cathy),1951年和1954年分别出版《论语》(Confucian Analects)、《古典作品选集》(The Classic Anthology)。庞德因而曾经被T·S·艾略特称作“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

庞德在翻译《华夏》之前,还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字一无所知。”^[3]他的翻译完全凭借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笔记。费诺罗萨在两位日本学者的帮助下对一些古诗做了详细的英语注释。当时的庞德,正处于踌躇满志的年龄,早就厌倦了后维多利亚伤感的诗风、前人抽象的说教和陈旧的题材,他尝试用“意象”诗。得到费诺罗萨的笔记,使他如获至宝,便以翻译中国古诗为契机来实践自己新的诗学观。《华夏》中共有十九首诗,包括《诗经》一首、古乐府二首、陶潜、卢照邻、王维各一首、李白十二首。在《华夏》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不用连接词的形式彼此对应的译文。

1)“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诗句被译为:

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2)“惊沙乱海日”的诗句被译为:

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

3)“荒城空大漠”的诗句被译为:

Desolated castle, the sky, the desert

显然,庞德不是一个遵守英语规范的人,庞德的译文直接照搬源语意象,从形式上看几乎与源语一一对应,而缺少规范英语所必须的一些物主代词或其他的连接词。究其原因,在于他的翻译主张和诗学理论。

庞德主张“创造性”翻译,这源于他的诗学思想“日日新”。“日日新”是庞德泊自中国《礼记》第四十九节,即《大学》中的词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他的“日日新”的诗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布拉格学派提出的结构主义观点“艺术的定义就是脱离常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他要改革,改革陈旧的诗风,用坚实、鲜明的“意象”使诗歌重获新生。“意象”,在庞德看来,是“形式、零星和

个别的细节”,是“只有在一瞬间才能抓得住的真实”^[4],如他的诗作《在地铁车站》,反映到他的译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意象的连用和叠加。曾经有人称中国诗歌的创作是“零度写作”,但庞德认为中国诗歌就是“接近骨头”(nearer to the bone)。西方诗是有一分讲十分,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如斯宾塞的《仙后》;而中国诗歌是有十分讲一分,隐而不露,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受中国诗歌这些特点的影响,庞德在中诗英译时,沿用了这一中国传统,不遵循英语的规范,为在翻译中忠实地再现源语的形式,拒绝使用任何的连词来表明诗句中各个意象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尽量地贴近中文,不做任何更改,把中国诗歌原原本本地移植到西方,使西方人眼前一亮,继而趋之若鹜。

也有译者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常遵循英语的规范,增加物主代词或连词。以李白的诗歌《送友人》中的名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为例,比较两种译文:

1) 翟译: Your heart was full of wandering thought;

For me—my sun has set indeed;

2) 庞译: Mind like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与原文试作比较,译文中增加了规范英语中的常用成分:物主代词“my”、“your”、动词的时态。然而,经过这样的添加,原文的思维空间骤然缩小了,中国诗歌本意的“模糊性”和“诠释弹性”^[3]消失了。相比之下,庞德的译文虽显得奇特,但他忠实地再现了源语的形式,实现了译语与源语的形式对应,留给读者广阔的诠释空间。

庞德的这种手法,被美国当代评论家劳伦斯·W·契索尔姆(Lawrence W·Chisolm)称为“脱体法”(disembodiment)。这种不用冠词、没有主语的直接借自中国诗的手法,在实现译文与源语形式对应的同时,赋予了诗歌意象更广泛的一般性。

三、形式对应的局限性

形式对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忠实”要求,再现了源语的“丰姿”^[5]。同时,形式对应的翻译能丰富本民族的语言,有助于“输入新表现法”^[3]。《华夏》(Cathy, 1915)作为庞德翻译中国经典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在1915年出版后,立即在西方掀起了一场“中国热”,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佳的十余首之一”^[4],并被认为是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当时美

国《诗刊》主编哈利特·蒙罗不久后总结这种趋势说:“自从1917年以来,追寻中国宝藏的努力带来了许多令人着迷的试卷,……中国诗那种新的表现法,那种出奇的现代性,使它有资格在一本20世纪诗选中占一席之地”^[3]。的确,庞德这种为实现个人新的诗学观,大胆尝试其“创造性”翻译理论的做法,在实践上得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赞赏,也令很多人跃跃欲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洋泾浜小调”式的译文。美国当代翻译家爱里克·萨克海姆(Eric Sackheim)将曹操的诗竟翻译成这样: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Facing wine, should sing, Man's life, how long?

“Just like morning dew”, Gone days, regretting many.

而遭到了“规范派”代表戴维·拉铁摩尔不客气的批评。

庞德也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翻译成“Spring, River, Flower, Moon, Night”,这足以说明他在翻译诗歌时追求形式对应的实践对他人的影响。然而,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对应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再以庞德译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为例。

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庞德所译的李白的这两句诗,被称为“中国式英语诗”(Sino-English poetry)。这些诗的译文完全照搬中国句法,“英语到了读不懂的地步”^[6],以至于《泰晤士报》一位书评作者质疑中国的汉语:“我们不明白,汉语是否真的像庞德先生的语言那么奇怪?”^[3]有中国学者认为庞德翻译的诗歌“似乎不能当作严格的翻译作品看待,因为一对照原文我们就会发现它有许多不忠实之处”^[7]。毕竟,汉语语言的表意文字的“粘着性”特点以及汉语“语法的隐含性”^[8],再加上庞德的翻译依靠是费诺罗萨的笔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也是一个严肃的翻译工作者应当尽量避免的。但以“翻译就是创作”、“翻译就是叛逆”的观点来论,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9~12]。

四、结语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曾说:“所有翻译都

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近本民族特点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以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诗歌的翻译当然也不例外。追求形式对应的诗歌翻译因为极力地贴近原文,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向读者移植了异域的文化和语言,有助于丰富译入语的文化和语言表现法。然而,这样的翻译因为充斥着异化的词汇和句法,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要求,不易为出版商和读者接受,不易流行。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多元文化的融合大众的宽容,这样的翻译终究也会为人们接受。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2]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英汉互译[M]. 上海: 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3] 赵毅衡. 诗神远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4]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5] 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 [6]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7]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8]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9] 车明明. 论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译者视角[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4): 71—74.
- [10] 罗选民. 英美文学赏析教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董丽霞.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翻译技巧与实例分析[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3): 94—96.

(上接第 54 页)

对于区域生态经济建设这样复杂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依赖“习惯—习俗—惯例—法律”这样的演进路径自发形成有效的制度, 其成本(含时间成本)相当高昂, 如果由政府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章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在自身权力范围内设计有关规章制度, 则能有效降低制度成本^[9]。

自 20 世纪以来, 无论什么体制的国家, 其政府的职能都有了很大扩张, 政府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政府行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表明, 在西部生态建设过程中更好的选择是政府在保证市场机制较好发挥对生态资源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有效介入, 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进行干预, 服务于西部生态建设和管理。不仅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 更要发挥领导和推动西部开发的一系列特殊职能; 不仅要担当宏观调控者, 同时也是主导者和直接参与者^[10],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才能重建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参考文献:

- [1] [美] 吉里斯, 波金斯, 罗默等. 发展经济学[M]. 黄卫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 [2] [日] 青木昌彦, 奥野正宽, 冈崎哲二. 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M]. 林宏彬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 [3]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 [4] [美] 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第二版)[M]. 梁小民, 黄晓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5] 张安录.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能[J]. 生态农业研究, 1996, (2): 32—35.
- [6] 王朝全. 生态经济建设的特性与地方政府的作用[J]. 经济体制改革, 2004, (1): 56—59.
- [7] 韦 苇. 因地制宜、辨证施治建设山川秀美绿陕南——关于陕南三市山川秀美工程与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的调研报告[J]. 现代种业, 2004, (专辑): 7—13.
- [8] 姚慧琴.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政府的特殊职能[J]. 管理世界, 2000, (5): 36—40.
- [9] 周 毅, 王学伍. 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 11—22.
- [10] 樊根耀. 环境资源的特征及其制度意蕴[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 26—29.